

莫拉维亚作品·长篇小说



鄙视

Il Disprezzo

Alberto Moravia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译林出版社


鄙视

Il Disprezzo

Alberto Moravia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鄙视 / (意) 莫拉维亚 (Moravia, A.) 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2

(莫拉维亚作品)

ISBN 978-7-5447-4539-0

I. ①鄙… II. ①莫… ②沈…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2963号

- 书 名 鄙视
作 者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译 者 沈萼梅 刘锡荣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杨 莉
原文出版 Gruppo Editoriale Fabbri, Bompiani, Sonzogno,
Etas S.p.A., Milano, Italia, 199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53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39-0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Alberto Moravia, 1907—1990) 是意大利二十世纪举世瞩目的划时代小说家。他在毕生创作的近十八部长篇小说和十二部短篇小说集中, 剖析了人的绝望感和忧虑, 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 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作品揭示和探讨了人的社会存在, 凸现了道德和行为、目的和手段、生存自由和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冲突, 以及人的理想和现实的迥然不同。

莫拉维亚自称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曾经感慨地说道: “社会在前进, 社会却无力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有的问题能够解决, 有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他认为: “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现代人怎么变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 而不是一种目的了。”(《作为目的的人》, 1964年)

莫拉维亚是一位对事物有透彻的洞察力的小说家, 他认为作家应该就是“其所处的时代的一双警觉的眼睛”。莫拉维亚就是用他深邃的目光, 揭示了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

义社会所掩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人们精神上的空虚。

在法西斯专政期间莫拉维亚的多部小说因其鲜明的反法西斯倾向而历次被当局查禁。战后的莫拉维亚陆续发表了《违命》（1949）、《鄙视》（1954）、《同流者》（1957），以及在战后新现实主义文学鼎盛时期创作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均深刻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急剧的变化。

《鄙视》是莫拉维亚揭示现实社会悲剧性的“夫妇关系”的一部代表作，其时代背景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动荡的意大利。

《鄙视》的主人公里卡尔多·莫尔泰尼是一位穷困潦倒的影视评论家，婚后两年当打字员的妻子埃米丽亚跟他的关系始终融洽，家庭生活也甚为和美。他为了满足妻子向往过富裕生活的欲望，就迎奉一位电影制片商与其合作的要求，为制片人编写电影脚本，从而获得一大笔酬金，签署了购置一套住房的合同。但他始终得追随那位制片商，以能继续从事电影编剧的工作，付清购买住房的钱款。然而从此他遭到了妻子的“冷遇”，不仅不被妻子所爱，还受到其难以言喻的“鄙视”；后来因他自己对制片商追逐妻子的卑劣行为的漠然、迁就和容忍，致使妻子沦为制片商的情妇，从而剥夺了主人公作为男人的尊严，使其觉得“自己因贫困而自感卑微，天

生就卑微”。夫妻之间在情感上的无法沟通，造成了难以填平的鸿沟。里卡尔多痛苦万分，最后决定放弃编剧工作带妻子回罗马，重新找回以往温馨和美的家庭生活，找回作为男人的尊严。然而他妻子执意让他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还得交付买房的钱款。结果妻子决定跟制片人先回罗马，路途中却因一起车祸而不幸丧生。里卡尔多从此就“昏昏然处于对现实的厌恶和对幻象的依恋之中”，借以逃避无法直面的现实世界。

莫拉维亚笔下的里卡尔多跟与《鄙视》主题雷同的其他几部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都在与现实抗争，竭力想征服现实，因为他们感到受到现实社会的排斥，无法融入现实生活”。小说《鄙视》就是从一对普通的夫妇感情生活的破裂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现代人深刻的精神危机。

整部作品既具有存在主义的风格，又颇具欧洲表现主义的艺术色彩。意大利著名文学评论家切基（Emilio Cecchi, 1884—1966）在《鄙视》一书出版后曾认为它是莫拉维亚“文学造诣最高的作品之一”。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莫拉维亚在其作品中擅长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对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分析得鞭辟入里，真切感人。《鄙视》一书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失去了自我存在价值的男子不可名状的苦闷、惆怅、无奈而又无助的心态。妻子为什么鄙视他？妻子在潜意识中竟认为丈夫是为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想成全制片人的

美意，而把自己推向制片人的怀抱。由于主人公“根本无法为这种鄙视寻找到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小的理由，所以就深感委屈，同时又感到害怕，生怕妻子鄙视自己的理由在客观上是有根据的，对别人来说显而易见，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小说《鄙视》用的是倒叙的手法，主人公通过回忆叙述了自己与妻子从相亲相爱到感情彻底破裂的全过程，读来令人感到真切而又有说服力。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参加完妻子的葬礼后就启程离开罗马，期望回到妻子生前曾出现过的地方，或是曾经让他见到过她的地方，他想“重新向妻子表示他的爱，重新赢得妻子对他的理解，重新获得妻子对他的爱的承诺”。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了，他“似乎早已被排斥在这样的天地之外了”。这正与小说的开头作者对恩爱的夫妇关系所抒发的感受遥相呼应。当初他觉得：“爱自己的妻子，又被妻子所爱，这本来是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爱情和幸福“如同人们日常呼吸的空气，人们往往不知道珍惜，只有在缺少空气的时候，才觉得空气之可贵”。

沈萼梅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Il disprezzo by Alberto Moravia

Copyright © RCS Libri S.p.A. -Milan

Bompiani 195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CS Libri S.p.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35 号

第一章

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婚后头两年，我与我妻子的关系很和美。我是想说，那两年之中，我们深厚和融洽的感情是带有某种朦胧的色彩的。说得白一点儿，在那种处境中的人，头脑比较简单，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断，对所爱的人只是一味地爱，顾不上加以品评。总而言之，当时埃米丽亚在我眼里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我在她眼里也是这样。或许是我也看到了她的缺点，她也同样看到了我的缺点，但由于爱情产生的一种神秘的嬗变力量，双方的缺点在对方的眼里不仅是宽容的，甚至是可爱的，缺点也成了优点了，尽管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优点。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互都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故事想要讲述的是在我还一如既往地爱着埃米丽亚，对她没有任何成见时，她是如何发现了，或者说是自以为发现了我的某些缺点，因而就开始对我有了成见，不再爱我了。

人们越是不计较幸福，就越是感到幸福。说来也怪，那

两年，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腻烦了。自然，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幸福。我觉得我做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爱自己的妻子，并被妻子所爱；我觉得这种爱是一种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就是说，一点儿也没什么稀罕的；犹如人们呼吸的空气，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缺少空气时才觉得空气之珍贵。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说我是幸福的，我甚至会觉得诧异；我很可能回答说我并不幸福，因为我无法保证将来是不是也这样，尽管我爱我妻子，而且我妻子也爱我。确实，当时我们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计。我在一家不起眼的报社里搞影评，另外还干一些记者的工作；我们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是与房东合住一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常常买不起，有时候连起码的生活用品也买不起。这样的生活怎么能谈得上幸福呢？不过，对此我倒是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我恰恰是一个真正彻底幸福的人。

结婚两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因为我结识了一位电影制片人，他的名字叫巴蒂斯塔。我为他写了第一部电影脚本，开始时我只把它视为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我在文学上曾有过很大的抱负，可不曾料到后来编写电影脚本竟成了我的职业了。与此同时，我与埃米丽亚的关系却越来越糟。我的故事就从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的职业，以及我与我妻子关系的开始恶化讲起，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它们之间又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以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我仍隐约地记得一件事，在当时看来，这事并不起眼，可后来却变得非同小可。一天，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埃米丽亚、巴蒂斯塔和我在一家饭馆吃了晚饭，巴蒂斯塔提议到他家去玩玩，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随后我们三个人都站在了巴蒂斯塔的小汽车跟前，那是一辆红色的豪华小轿车，体积不大，只能坐两个人。巴蒂斯塔已坐在驾驶座上，他打开了车窗，从汽车的那一边探出头来说：“很抱歉，只有一个位子；莫尔泰尼，你得自己想办法……除非你愿意在这儿等我：我把车开回来接你。”埃米丽亚站在我身边，穿着一件黑色丝绸晚礼服，这是她唯一的一件敞领无袖衫，手臂上搭着短皮披风：虽说已是十月份，但天气还挺暖和的。我望着她，她很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平时安详而又娴静的她，那天晚上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和烦躁。我高兴地说道：“埃米丽亚，你就先跟巴蒂斯塔走吧……我叫辆出租车在后边跟着你们。”埃米丽亚看着我，然后，迟疑而又慢吞吞地回答道：“让巴蒂斯塔先走一步，我们俩一起乘出租车去不更好吗？”这时，巴蒂斯塔把头伸出车窗外，开玩笑似的大声说道：“好哇，你是想让我自个儿走。”埃米丽亚说：“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突然，我发现她那平时总那么平静而又和谐的漂亮面容，现在却阴沉了下来，而且因为犹豫和尴

尬显得有些扭曲。我急忙说道：“巴蒂斯塔说得对，你去吧，你跟他先去，我叫辆出租车。”这回埃米丽亚让步了，或者说服从了，她上了汽车。不过，现在我在写这个故事时才想起了当时的那种异样感觉，当她坐在巴蒂斯塔旁边时，车门还开着，她望着我，尴尬的目光中夹杂着恳求和厌恶。不过，当时我并没在意；我毅然关上了车门，像是关上保险箱门似的。汽车开走了，我吹着口哨，高兴地朝附近的出租汽车站走去。

制片人的家离饭馆不远。正常情况下，我乘出租车差不多可以与巴蒂斯塔同时到达，或者最多稍晚一点到。然而，半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人汽车撞上了，两辆车都遭受了一些损伤，出租车的挡泥板撞弯了，小汽车的一侧撞坏了。两位司机当即下了车，他们相互指责，争吵谩骂起来，随即一群人围了上来，一名警察过来后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整个过程中，我都相当耐心地等在车里，甚至还挺开心，因为我吃饱喝足了，而且巴蒂斯塔在用餐后还提出请我参加一部电影脚本的编写工作。不过，由于争吵和冲突持续了十分钟，或许是一刻钟左右，我到制片人的家时已经晚了。当我走进客厅时，我看到埃米丽亚跷着个二郎腿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巴蒂斯塔坐在角落里的一个旋转酒柜跟前。巴蒂斯塔快活地招呼我，埃米丽亚却以埋怨、甚至恼怒的口吻责问我

这么久都上哪儿去啦。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发生车祸了，我发现自己是以一种回避的、像是有什么事情想瞒过去似的口吻说的。其实，当我自己所说的事情并不看得很重时，往往就采用这种口气。但埃米丽亚却不放过，始终以那种特别的声调追问我：“一起车祸……什么车祸？”于是，感到惊异的我，也许甚至有几分惶恐不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车祸的经过。不过，这回我似乎又过分渲染夸张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总之，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就在于开初太有所保留，而后来又太精确了。不过，埃米丽亚不再刨根问底了；巴蒂斯塔却满面春风而又和蔼可亲地在桌上摆放了三个酒杯，请我喝酒。我坐了下来，我与巴蒂斯塔边聊边开玩笑，我们在他家待了两个小时。整个晚上，巴蒂斯塔都那么兴高采烈，侃侃而谈，我几乎没有发现埃米丽亚的闷闷不乐。再说，她历来都是那么缄默不语，羞羞答答的，因为她生性胆怯，所以，我对她的缄默并没有感到惊异。不过，平时她至少以微笑的目光参与大家的谈话，然而，那天晚上她却连一丝笑容都没有，这倒颇使我感到诧异。后来，巴蒂斯塔又跟我一本正经地谈论起我与他合作的影片，他给我讲了故事梗概，还向我介绍了导演以及与我搭档的编剧情况，最后他叫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签署合同。埃米丽亚趁无人说话的当儿，站起身来，说累了，想回家了。我们与巴蒂斯塔告了

别，走出他家，下到底层，来到街上，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到出租汽车站。我们上了车，车子立即就开了。巴蒂斯塔的提议使我喜出望外，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对艾米丽亚说道：“这部电影脚本来得真是时候，否则，我不知该怎么过日子……我本来都想去借一笔债了。”艾米丽亚直截了当地问道：“当电影编剧能得多少酬金？”我说了酬金总数，并补充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今年冬天不会成问题了。”说着，我去拉艾米丽亚的手。她由着我握住她的手，回到家之前，她始终没再说话。

第二章

从那天晚上以后，编写电影脚本的事进展得很顺利。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巴蒂斯塔那里签了编剧的合同，并得到了第一笔预支金。记得那是一部无足轻重的喜剧性言情片，一向创作态度严肃的我，满以为自己不适合编这一类影片的本，可是，在编写过程中，我却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天赋。就在那一天，我还第一次与导演和另一位编剧碰了面。

我当电影编剧的生涯是从去巴蒂斯塔家喝酒那天晚上开始的，对此，我可以确切地指明；而我与我妻子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恶化的，我却很难确切地说清楚。自然，我也可以把那天晚上看作我们夫妻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可是，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是马后炮；再说，埃米丽亚对我态度的变化，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然而，她的态度的确是在那天晚上以后才开始有了变化的，确实，我真说不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天平秤盘才开始失去平衡的，也不知这种失衡究竟会引起什么后果。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

到巴蒂斯塔，类似那天晚上头次在他家里的那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可以说，那些事情当时在我看来都很平常，但后来却多多少少有一种特殊的意味。我只想列举一件事。每次巴蒂斯塔邀请我们，埃米丽亚总是先表示很勉强，不太想陪我去，而她的神情和托词又总是那么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她总是找某种与巴蒂斯塔无关的借口推托不去，同样我也总是轻而易举地指明她的借口站不住脚，我执意追问她是否不喜欢巴蒂斯塔，问她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最后她总是回答说，并不是她不喜欢巴蒂斯塔，说她对他并无什么可指摘的，只是不想与我们一起出去，因为这种晚上的聚会会使她感到疲惫，实际上是令她感到厌烦了。我不满足于这些泛泛的解释，于是又暗示她与巴蒂斯塔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即便巴蒂斯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也不想知道这一点。然而，我越是一个劲儿地提示她是否对巴蒂斯塔没有好感，她似乎越是一个劲儿地否定。最后，她就全然不犹豫了，代之以明朗而又坚决的态度。于是，我不再怀疑她和巴蒂斯塔之间的感情。接着，我就摆出一大堆她应该参加我们的晚会的种种理由：我没有一次外出不带着她，巴蒂斯塔深知这一点，巴蒂斯塔喜欢有她在场，每次他请我们，都这样关照：“自然，你得带上你的妻子一起来。”她倘若无故缺席，必定会惹巴蒂斯塔不高兴，说不定还会触怒他，而我们的生活却全依仗他。总之，

她提不出任何托词不出席，我却能说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她出席，所以，尽管她很疲惫也很厌烦，最终也只好去赴会了。埃米丽亚通常都凝神听我阐述这些理由，应该说，我给她讲道理时，我脸部的表情与手势比我说的话更有意思，所以，最后往往以她的让步而告终，她默默地穿好衣服，准备跟我出去。当她已准备停当，在临走前的最后一刻，我总要最后再问她一次是不是真不想陪我去，这倒并不是我怀疑她的回答，而是为了使她不怀疑自己有自主的自由。这时，她总是以明确的方式回答说她高兴陪我去，这样我们才走出家门。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发生过的好多事情，当时我都没在意，后来回想起却都意味深长。当时，我只意识到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开始恶化，而我却没有去加以任何解释和论定。家庭气氛开始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压抑了，就如晴朗的天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似的。我开始想到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爱我了，因为我发现她不像初婚时那样老想接近我。那时，当我说：“你瞧，我又得出去了，一去就得几个小时，我会尽快回来的。”她虽不表示异议，但看得出她是满脸忧郁地顺从着，明显地不乐意我走。所以，我常常不是借故把工作推掉不出去，就是尽可能地带她一块去。当初她是那么离不开我，以至于有一天，